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问题与立场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

戴阿宝 李世涛◇著

本书以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分专题进行深入讨论，力求比较完整和深入地反映、揭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全貌。丛书着重以学术史的研究方式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意义、方法和意义。本书以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方向、特性和价值，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总体学术历程、知识背景及其变异，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对本土美学资源的承续与突破，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学术论争及其学术建构价值。

汝信 王德胜 主编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20世纪
中国美学史
研究丛书

汝 信 王德胜 主编

问题与立场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

戴阿宝 李世涛◇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题与立场/戴阿宝,李世涛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4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ISBN 7-81064-886-1

I. 问… II. ①戴… ②李… III. 美学史—研究—中国—20世纪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3186号

20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WENTI YU LICHANG

问题与立场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

戴阿宝 李世涛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cnu.cn

E-mail cnup@mail.cnu.edu.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25千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作者介绍】

戴阿宝，1960年11月生，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现供职于《文艺研究》编辑部。

李世涛，1969年12月生，河南浉池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20世纪
中国美学史
研究丛书

汝 信 王德胜 主编

【问题与立场 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

戴阿宝 李世涛 著

【承续与超越 20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

袁济喜 著

【引进与变异 西方美学在中国】

彭 锋 著

【美育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谭好哲 刘彦顺 等著

【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马 驰 著

【创世之音 中国美学1900~1949】

王德胜 等著

【分化与突围 中国美学1949~2000】

薛富兴 著

总序

历经百年，中国美学在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曲折走入了较为自觉地追求思想的体系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这样一个现代形态的学术行程，从具体的理论观念到整体的学术思维形式都发生了重大转换。其百年来不断创新、求变的理论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那样鲜明且确有成效，令人对之产生浓厚的追索兴趣。

也因此，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界对本土问题的理论探究兴趣不断增长，有关上一个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美学界不仅为此连续举办了多个专题会议，集中讨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及其价值特性，同时，许多学者在近年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力图为 21 世纪中国美学新的学术深化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探讨 20 世纪中国美学现象和问题的時候，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具体概念、命题或观念等的自我演化线索或个别美学家的理论成就。事实上，作为客观历史过程的学术活动，美学的生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纯逻辑

的。美学之所以在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活动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同它在理论上始终保持了与现实思想文化运动的具体关系是直接相关的。要想充分把握 20 世纪中国美学百年发展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就必须深入到整个 20 世纪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历史真实之中，从文化整体上来考察美学自身的理论历史，并从美学的整体活动来把握其思想蕴涵，使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从纯粹理论的逻辑演绎扩展为一种思想的持续进程，进而“重构”其学术发展的历史价值。这样，20 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研究才会更加突显出理论本身的文化和思想的价值。例如，包括美学在内，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意愿，即以学术方式致力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为现代中国社会设计民族振兴、文化进步、生活幸福的理想模式。由此，现实与理想、困厄与超越的矛盾便深深融入了各种学术的努力之中，既影响了学术活动的存在形态，又影响了其具体理论的表现形式。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应从这一方向去求取有关历史客观性的具体表现。

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必然涉及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学历史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确定。我们的探讨，重点应在于把握美学演进中的主要历史结构规律、结构性质及结构方式，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寻找美学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揭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相关性的美学的历史存在形式，而不是简单地依照“时间表”来划定近代、现代和当代等“历史段落”，或单纯理解为一套理论概念、命题等的逻辑串联，令美学史变成诸多概念、命题的机械整理和堆砌。也就是说，在研究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美学本身

的结构连续性，而不是历史的时间构架——美学理论的逻辑完整性必须体现出思想的有机进化层次。何况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来说，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虽然是确定的，但理论的具体结构和活动又具有种种或然性，它们之间存在着需要我们从思想整体上去把握的规律、性质和方式。即如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及其思想方法的关系来说，我们就应思考：一方面，接纳西方美学的中国学术语境有什么特点？另一方面，在20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西方美学从具体概念到基本方法出现了哪些变异？这种变异之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积累的影响是什么？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中，西方话语的存在根据往往在于引入和保存其具体形式的中国学术语境本身的现状，那么，把这个问题纳入美学的历史研究，为的就是从中看出20世纪中国美学的自身精神取向及其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依据，进而把美学理论的演化过程同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真实学术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组织写作这套以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内容的丛书时，着眼的不仅是总结、反思，以求比较完整和深入地反映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面貌，而且试图能从学术史层面建构起一种新的美学史观和美学史研究方式。也因此，本丛书突出了“以问题带史”的特点，强调以学术史研究的立场来讨论20世纪中国美学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学术史所倚重的知识价值特性与知识含量增长来反顾百年中国美学的意义。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当前中国美学界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探讨涉及了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的各个方面，

■ 总序

包括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总体学术历程及其建构方向、特性和价值，马克思主义美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20 世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关系以及对本土美学资源的承续与突破，20 世纪中国美学重要论争及其学术建构价值，20 世纪中国美学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建设的影响和启示，等等。相信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 20 世纪中国美学学术问题会有着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汝 信 王德胜

2006 年 7 月

目 录

引论 20 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1
第一节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发轫的基本特质	2
第二节 审美功利主义与审美自由主义的对峙	9
第三节 朱光潜、蔡仪美学建构的意义	17
第一章 时代转换与美学大讨论之可能	24
第一节 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与美学批判	24
第二节 百家争鸣与美学大讨论的可能性	31
第三节 美的本质与美学的时代特征	37
第二章 三派分立与大讨论前期的基本问题	48
第一节 关于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及其争鸣	49
第二节 关于美的客观典型说及其争鸣	64
第三节 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及其争鸣	77
第三章 大讨论后期的视野拓展与理论探索	92
第一节 社会生活的美学及其争鸣	93
第二节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及其争鸣	109
第四章 新启蒙与美的历史责任	132
第一节 思想解放与新美学原则的崛起	133
第二节 人的问题与美的问题	142
第三节 学术人格与新美学的呼唤	151
第五章 共同美和自然美	155
第一节 共同美和审美观念的匡正及其争鸣	156
第二节 关于自然美讨论的简要回顾	166
第三节 七八十年代的自然美问题及其争鸣	182

第六章 马克思《手稿》的美学视野	205
第一节 “人化的自然”及其争鸣	206
第二节 “美的规律”及其争鸣	227
第三节 异化劳动和“劳动创造了美”及其争鸣	247
第七章 90年代美学研究的学术背景	261
第一节 知识转型与新美学理论建构之可能	26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拯救美学的路径	273
第八章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	283
第一节 实践美学的几家观点及其争鸣	283
第二节 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超越及其争鸣	296
第三节 关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评价及其争鸣	321
第九章 审美文化与美学研究的变革	335
第一节 审美文化概念和内涵及其争鸣	336
第二节 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及其争鸣	343
第三节 作为学科研究的审美文化及其争鸣	354
余论	364
后记	374

引
论

20 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在探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时，李泽厚曾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来定位，^①这一阐释的合理性尽管可以质疑，但李泽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首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基本框架。“启蒙”既是思想活动又是理论选择，“救亡”既有外在压力又有内在需要，两者构造了内与外、心与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简言之，“启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 19 世纪下半叶开启了现代性进程，这种被迫唤起的自新意识在 20 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广泛传播开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由日本和苏联引入，不仅被推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思想，而且从 30 年代开始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但在马克思主义全面介入之后，现代性内涵发生变异，即主义的合理性成为一切问题合理性的根据，而之前的“启蒙”思想中的学术自律和自由主义倾向遭到批判。“救亡”则主要是指救民族之亡。“启蒙”之所以发生变异可以从“救亡”这一迫切的现实需要中找到根据。假如中国现

1

20 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丛书

^① 李泽厚指出：“以专注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5 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代不存在严峻的外部压力，那么“启蒙”大致会因循西方已有之路径而顺利进展，但事实却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是中华民族被欺凌、被压迫的历史，所以拯救中华民族之生存危机成为了中国现代史的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武装革命理论与民族“救亡”实践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救亡”作为一种根本性动力使得“启蒙”不能不向功利主义一边滑动。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在这样一种两难的、摇摆不定的境遇中不断展开着，这一特征必然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和发展造成深刻影响。

第一节 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发轫的基本特质

从表面上看，中国现代美学发轫的基本特质在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的突然中断。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兴起截然不同，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被迫纳入到现代性发展轨道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而起步的。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学东渐”浪潮源源不断地弥漫于中国学界。这一浪潮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学界的视野，使之逐步认识到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面前的劣势。蔡元培说过：

中国人羡慕外国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们的枪炮比吾们的好。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又看到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①

对落后的痛切认知成为中国学界现代“启蒙”的原动力。在先辈的

^① 《蔡元培美学文选》，146~1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眼中，如果他们认同“启蒙”这一术语的话，他们肯定会认为中国现代所发生之事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反动，是在西学背景下重构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的努力。那么，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是这一“启蒙”的一部分，当无疑义。^①但对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

尽管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中，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没有能够发展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基本构架，但与西方美学思想相比较，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李泽厚和刘纲纪曾就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与西方学术重视宇宙论、认识论不同，中国学术努力追求人格道德的完成，把善作为最终归宿。这一点表现在美学上就是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把审美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二、中国美学在谈论情感时十分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其中的“理”主要是指伦理。西方美学经常讨论美与真的关系问题，而中国美学认为真就包含在善中，“情”与“理”的统一，既是“情”与善的统一，也是“情”与真的统一。三、基于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中国美学试图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寻找美，把人顺应自然作为道德精神的体现，也作为美的体现。四、与西方通常以宗教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同，中国则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②有鉴于此，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审美伦理学，或者说是一种审美道德学。在审美的具体方式上，中西之间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张法对此有过分析：

① 陈伟指出，中国现代美学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而降生，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是从感性的角度研究人和世界的学科，它把人在对感性世界认识中的作用显著地突出了。这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所竭力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高扬理性主义、压制人的感性本体方面的意识流向正好相反”。陈伟由此认定，中国现代美学的“启蒙”意义首先就在于对美的肯定，第一次把美“放在至少不低于理性的善的地位”上。参阅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部分。

② 参阅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20~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一、在观照方式上，中国采取仰观俯察，远近往还的散点游目，西方运用的是选一最佳范围，典型地显示对象的焦点透视；二、在进行纵深观赏时，中国讲究品味和体悟，西方重视认识和定性；三、在审美过程中，中国要求主体虚心澄怀，去情去我以体会对象的神韵，西方主张主体通过放纵情欲而净化自己；四、在审美效果上，中国要求主体在审美中提高自己，达到或趋向客体的境界，西方希望主体在主客的交流中，既突破自己的局限，又突破对象的局限，而达到一种主客都未曾有的境界。^①

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中西在具体审美方式和总体美学追求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西致思模式的不同：中国以体悟玩味和整体观照为特征，西方则以具体分析和逻辑推理为特征；中国以伦理和道德原则为旨归，西方则以实现自我为目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之所以缺乏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素质，是中国古典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超越，首先着眼于审美方式，或者说着眼于审美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当然，这一问题本身相当复杂。从承继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若干精神有所反思和张扬，比如对美的感性本质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对美善关系在“启蒙”基础上的调整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审美伦理性质或审美道德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冲突。美善关系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时期虽有所改变，但美善关系的基本特征（美善密切相关、善高于美）并没有多大改变。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发轫特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我们从整体的历史过程中确实应该认识到，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具有相当的差异，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与中国古典美学完全不同的西学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但历史

^①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进程往往也在和人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一部分的中国现代美学，它所发轫的内在动机是由外在压力形成的，外在压力最终转换成为内在动机，而这一内在动机最终也必然会转换为由外在压力所造成的欲消除外在压力的现实努力，中国现代美学的内在动机实质上已经暗含了必须服从的某种外在目的。从学理上说，美学的基本性质与中国现代美学发轫的内在动机是有矛盾的，但在“西学东渐”所催生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期，中国美学界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有的矛盾，而是试图十分合理地把它们镶嵌在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大舞台上。

以王国维和蔡元培这两位中国现代美学发轫的奠基者为例。王国维是把西方美学概念引入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人。王国维本人对美学的理解因循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基本精神。他说过：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其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①

显然，在王国维的心目中，自律性和非功利性是美学的基本特性。在分析何谓美的自律性和非功利性时，王国维提出了美在形式的主张：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观之对象，汗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②

王国维这里所说的“汗德”即康德。可见，王国维对西方美学性质

①② 《王国维文集》，第三卷，31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的认识与康德关系密切。^① 这种把形式作为美学的自律性和非功利性的表征有其比较确切的一面。从历史上看，西方美学思想可大致分为自律和他律两大基本走势，但这一走势在现代呈现出明显变化。随着鲍姆加通提出建立美学学科，尽管其中包含唯智主义，即试图把以往认为是无法理性化的感觉和心理的某些内容纳入认识论之内，现代美学开始受到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更为强烈的影响，而传统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处于劣势。从王国维本人所接受的西学来看，生命哲学和唯意志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叔本华、尼采是他经常提及的名字。尽管西方现代美学与生命哲学和唯意志论没有直接联系，但在王国维那里情况已有所不同。从意志、从生命、从体悟出发来观照美学，把现实功利放在一边而从超越视角步入人之存在的生命体验，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道家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强调美学的形式自律性和非功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面既有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反拨，也有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王国维在谈及中国学术之发展时说：

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②

在另一处王国维还说过：

至我国哲学家及诗人所以多政治上之抱负者，抑又有说。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有，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

^① 参阅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其中提及读康德的情形：开始读康德，难以理解，无法卒读；在读叔本华之后，有所领悟，再读康德。“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王国维文集》，第三卷，469页。）

^② 《王国维文集》，第三卷，3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